

楊猷珍文集



楊
獻
珍
文
集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许爱仙

李保平

书名题字：启 功

装帧设计：邓汝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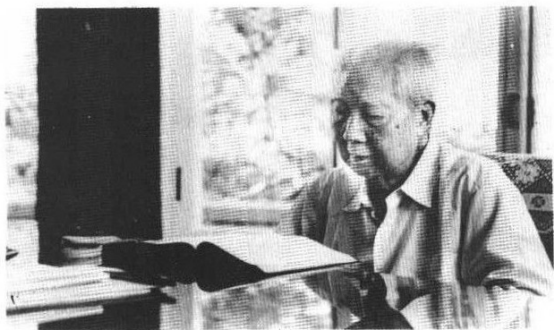
杨献珍文集

1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9.75印张 16插页 454,000字 印数：1—3,7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86·101 定价：（精）3.00元



杨献珍同志在读书



杨献珍同志在休息室里

的意志和认识也如此。所以，
 说它不承认被批评为中心意识，说
 它被批评为中心意识，就一定是
 片面的、成见的和偏激的。可以想象，如果
 我们只承认它有时是中心意识，而否认它
 有时是中心意识，那就不符合辩证
 唯物论的原则了。而只承认它是
 中心意识，而否认它有时是中心意识，
 那也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了。
 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中心意识，
 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它有时是中心意识，
 有时不是中心意识。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本质。

既就其所以于以必情在于实际中，
中正同情的唯物论，而因此与有机的
关系之个别的根本的也是相异的。在
工作中的根本的，中央的指示也说明机
理在工作中最根本的预备也。从这可以
了解到的工作思想是和现实有机体的，性
质是统一的。这是关于本书的反响。即末。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文的手迹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我的个人研究计划，现在还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一方面担任着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一方面还担任着科研的职务，教课，不但是在本校，还有校外的，主要讲唯物史观。想和定一个计划进行研究，但时间支配不过来。在科学界，多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向高级干部，我想，在他们之间进行唯物史观的讲授，这件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史观宣传工作中，要起一定作用的。因为，根据马恩列斯，任何一运动，没有它的第一级领导，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就担负着这个任务，帮助我们党和

杨献珍同志 1955 年 11 月 1 日写给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信

箋用校黨高級屬中央中共

國家的幹部學習階級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他們
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之後，認識了哲學的重要
意義，認識了哲學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認識了哲學和
一切實際工作的關係，這極，他們再回到工作崗位之後，就
會主動地積極地來領導其所屬的幹部學習馬克
思列寧主義哲學。黨中央給我們的編刊高級幹部的工作
的時候力之，今年已經開始，我自己這就想：在這三年內
我必須這件事，向他們黨和國家的幹部宣傳唯物主義，把我們
已的講義整理出來，不僅幫助幹部學習唯物主義，而
且幫助在幹部中的唯物主義的學習者。我自己目前所不能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用箋

生這批工作。個人工作計劃。關於研究計劃，我有一個想
目。他就要研究下去，抱不抱希望，所以不敢拿出來
書。我個人工作計劃，希望你們能給予指示。
敬祝！

楊獻珍
十一月一日

编 辑 说 明

《杨献珍文集》拟分三集出版，包括了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杨献珍同志的部分重要著作。选入文集时，属于讲课稿、发言稿部分，我们作了文字上的整理，对一些文稿进行了删节、增补，对已发表过的文章重新做了校订。杨献珍同志在长期工作中，作过大量的读书札记，在批判“合二而一”、十年动乱中，损毁甚巨。现存部分未选入文集。

编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启功先生为本书封面题了字，杨献珍同志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杨献珍著作整理组

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

目 录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一九四〇年一月）	1
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23
附记：	30
数一数我们的家当（一九四三年五月）	35
附：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出版	49
关于对事务工作的认识问题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	66
关于“杀头”与“洗脸”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83
再谈“杀头”与“洗脸”问题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	100
关于真理、经验主义、新老干部的关系及动	
机与效果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四月）	120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一九四七年五月）	152
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出发点（一九四七年）	186
平定荫营村的情况（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195
边府民教处及公安管理处是怎样“整”党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200
加强财经工作者的群众观点（一九四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	216
何谓理论与实际联系?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一九四八年冬)	222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 从毛泽东著作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	243
珍重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一九五一年	
九月十五日)	276
附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	
基层组织的决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摘录)	290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一年	
十二月一日)	293
关于《实践论》(一九五二年十月)	311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一九五四年	
三月二日)	353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	
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一九五五年	
五月二十一日)	363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问题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392
什么是唯物主义 (一九五五年)	423
(一) 引言	423
(二) 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	
关系问题	468
(三) 关于真理问题	538
(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562

（五）关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569
（六）关于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574
（七）自由与必然·····	586
（八）空间与时间·····	594
（九）关于党性问题·····	602
关于做什么学什么（一九五六年一月）·····	607
关于整风问题（一九五六年）·····	609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

（一九四〇年一月）

去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与晋东南同时发生旧军进攻抗日新军、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的非常事变。这件事决不能看作只是山西内部磨擦的问题。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变，是中国自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它和发生在湖南的平江惨案，河南的确山惨案，河北的张荫梧打八路军，山东的秦启荣打游击队，鄂东的程汝怀惨杀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一样，是大规模的反共逆流的一条支流。十二月政变是山西的分裂与团结、投降与抗战分野的开始，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假若自己还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所应当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秋林方面：十二月二十日新派代表梁化之亲率武装将牺盟总部负责人全部监视起来，将政治部的卫队全部缴械，一切进步的东西被摧毁尽净。就是公开地宣告了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之终结，宣告了它们从抗战阵营中转向投降与反革命。同时山西的投降活动又是全国反共投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政变又预示了全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某种程度的进步性之终结。自从梁化之由重庆回到秋林，说得非常好听，

* 这篇文章曾在1940年2月间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连载过。

他说：“谁对顽固分子让步，谁就是汉奸。”不只是梁化之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就连山西的最高统治者也说了许多好听的话，甚至在屠夫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刀的前一分钟，还在说好听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曾经对一部分进步人士起了麻痹作用，为他们赢得了发动反动政变的准备时间。再者，这是由于我们的警惕性太低，对于时局发展的严重性估计的太不足，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忍性认识的太不够，所以当事变突然到来，便暴露出了我们许多弱点，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损失。从前许多朝夕相处、看来很不错的朋友，而今好多都变成了敌人，变成了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但是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并不是这些投降妥协的反革命分子所能断送得了的。中国一切进步力量与广大人民必将严厉打击这些投降妥协阴谋，继续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一切妥协派、投降派、反动派、反革命派，都是在自掘坟墓，埋葬他们自己，最后胜利仍是属于一切进步力量，属于人民群众的。

从此，中国抗战的环境，将日趋艰险与复杂。因为在从前，大体说来，是大家一致对付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则是除了继续同日寇斗争以外，还要同国内的大批民族叛逆斗争。从前虽然除了同日寇的斗争以外也还同汉奸斗争，但那时汉奸的数量还比较少，而且面目是公开的；今后妥协投降派将一天一天比较多起来，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反共、反进步上，他们还会暗中与敌人携手。和他们干戈相见的流血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了。今后的环境就是这样日趋复杂，日趋残酷，一切抗日的革命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已放在这种艰险复杂的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来锻炼。如果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健全的革命干部，也只有自觉地和坚决地把自已放在这种环境中来锻炼才行。不要当前的困难面前气馁，要用最大的勇气来迎接当前的困难。

一、山西妥协投降活动之史的发展

（从秋林会议到十二月政变）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但由于他们的反人民性，他们的反帝坚定程度及其进步性是非常有限的。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到了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秋林会议是一个向后转的会议，会议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精神，但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来把整个山西拉上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民主、反抗战等问题，它运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磨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民运系统中的内部磨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投降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所谓“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等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磨擦组织，就是在秋林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总揽这些破坏组织的组织，则是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又闻“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核心组织是所谓的“新民党”，实际上是日寇的新民会的变种。

但山西存在着进步力量，进步力量是决不容许山西后退的。十二月政变乃是山西妥协投降派鉴于用和平方式不能把山西拉上妥协投降道路，而企图直接了当地采用暴力方式来把山西拉上妥协投降道路。

秋林会议的妥协投降色彩是极其鲜明的。如“建立小国家”

理论，强调“民族复兴”而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讨论阎司令长官所提的“缩小敌战区”的提案时，某厅长说：“讨论这些问题干吗？马上和议成功了，中日一家，还有什么敌占区？”特别是那时《大公报》发表了汪——平沼协定的消息，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动，他们大大地同情汪精卫的行动（大家都知道山西上层分子是与汪精卫早有历史渊源的）。秋林会议开幕时，要发表一个告民众书，许多代表提议在稿子中添入反汪词句而被拒绝。戎专员会毕，归来前辞行时，阎锡山亲自秘密嘱咐他，回到晋东南后，不要发表反汪言论。阎锡山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口口声声称之为“苏先生”，表现出无限羡慕的神情。他说：“苏先生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六十里。”文水县曾抓住一个刚由天津特务机关受训完毕派回山西活动的大汉奸，顽固分子就拍电要了回去，并说：“不要闹错，那是咱们的人”。去年四月，中央政府下令各战区全线出击，并派客籍军事顾问到各战区督战。那时秋林方面只对汪——平沼协定感到极大兴趣，而对于此种出击命令，则毫不感兴趣。因之，一面令新军不参加战斗，一面令旧军按兵不动。在二战区的某军事顾问，催促再三，毫无效果，愤不欲生，为此绝食二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是秋林会议时的形形色色，请看这形形色色说明了什么？

秋林会议以后，山西的顽固分子在妥协投降道路上加快了步伐。首先是倡言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取消群众团体，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是在这样地干着，如静乐、方山、中阳、离石、石楼等县，都把各种救亡团体取消了。其次是雷厉风行地调训全省军政民干部。此种调训，不是为了如何加强抗战力量，而是借此机会收买无耻和失意分子，进行挑拨离间，使之回到原来工作部门，

进行破坏工作，铺设投降道路。第三个显著现象，即派遣大批“蛇蝎虫蜒”到各行政区明地暗地进行破坏决死队、牺盟会、各救亡团体以及进步的抗日政权，到处散布荒谬谣言，以行其挑拨离间之阴谋。那些谣言与日寇汉奸所说的一模一样，都是来自日寇特务机关。所谓“蛇蝎虫蜒”，即有名的“精神建设委员会”、“治安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汉奸组织（阎锡山派遣那些破坏分子来晋东南时，临别训话有到晋东南后不惜作“蛇蝎虫蜒”之语，即“蛇蝎虫蜒”一语之由来）。第四个显著现象，即公开庇护汉奸。晋东南破获了敌人特务机关，即著名的贾荣科、雷振声等大汉奸案，这是与国家民族有益的，应受政府的嘉奖，却相反的，受到了上级的严厉申斥，壶关县长还为此被记了大过。高平县长奉专署令扣押贾荣科等所供出的汉奸嫌疑犯，竟因之而受到撤职处分。对于贾荣科等所亲口供出的汉奸聂士庆（长治县长）、于文华（五区保安九团团）、贾亮臣（五区专署行政科长），不惟不准扣押，且目之为忠实干部，并电令戎专员要负责把这些汉奸送回原职，某些上层顽固分子，在秋林公开向受训人说：“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的不同，当一个负责人，对国家有意见，是不能不说一说的。”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则说：“苏先生不是当汉奸，如果是汉奸，人家还给我们维持省钞吗？”独八旅公开张贴标语拥护“汪先生”，说：“汪先生是和平救国”，并“不许发表诋毁汪先生的言论”。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已经公开投降敌人，事实昭著，不但不下令申讨，反而通令不许说蔡雄飞是汉奸，而说是到太原去作“特务工作”。第五是公开与敌接洽投降。暂编第一旅旅长崔道修与敌人来往很久。该旅副旅长李龙标常到赵城城内与敌人联欢，敌人给以大批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崔部士兵所使用的都是这种伪钞。